

# 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百年综述

赵章超

〔摘要〕 20 世纪初由鲁迅等人开创的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筚路蓝缕，几经起伏，到本世纪初已取得了一系列实绩。这主要体现在对宋代志怪传奇小说地位和性质认识的演进、小说史的分期、作家作品的研究、小说理论的探讨及文献资料的考辨等方面。但是，相对于宋代诗、词、文的研究，志怪传奇小说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实绩；不足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02) 05-0141-03

宋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比较重要的一环，其中有着洪迈、刘斧、李献民等谁都不能忽视的创作大家，但是长期以来，它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李剑国曾说：“文言小说研究真正具备科学的学术品格，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还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事，这就是郑振铎、鲁迅等人所开展的具有拓荒性质的文言小说研究……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文言小说研究处于萧条局面”<sup>〔1〕</sup>，这是就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文言小说研究的整体状况来说的。如果再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一领域中，六朝、唐及清代研究多一些，宋代则很不受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除了一些史著对宋之志怪传奇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外，一定数量的单篇论文也昭示着其研究的实绩。本文就宋代文言小说的地位及性质、作家作品研究、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作一综述。

其一，如何认识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地位和性质，是研究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成就平平，难予首肯。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今人之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亦多持否定态度，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到现在，对其基本是避而不谈，如 60 年代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撰写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对宋代志怪传奇都只字未提。台湾巨流

图书公司 1988 年版的《中国文学讲话》洋洋洒洒十巨册，5500 多页，其《两宋文学》中也无志怪传奇小说一席之地。即或约略涉及，也是贬词，如吴组缃、沈天佑说“宋人的文言小说，无论是仿六朝短书体的也好，抑仿唐代传奇体的也好，从内容到艺术描写都无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sup>〔2〕</sup>。再看一些小说史家的观点，多有认为其仅前代之余波遗响，无有个性者。如鲁迅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也。”<sup>〔3〕</sup>郑振铎发表于 1931 年的《宋元明小说的演变》和 1959 年的《中国小说八讲》干脆对宋志怪传奇小说避而不谈。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编的《中国小说史稿》、《中国小说史》及侯忠义、刘世林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总体上沿袭了鲁迅的观点，如前者说：“宋代传奇（引者按：此处“传奇”兼指志怪、传奇二体）由于脱离生活，因袭模拟，没有创造，总的说来价值很低。”<sup>〔4〕</sup>后者也论其“多脱离现实生活，往往模拟前人之作，较少创新，无论思想和艺术都不如前代的作品。”<sup>〔5〕</sup>……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宋志怪传奇小说品格独具，价值不容忽视。如韩秋白、顾青说：“与唐人传奇相比，应该说宋人作品更集中、更鲜明地实现著唐沈既济提出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要求，爱情婚姻题材显著增加”<sup>〔6〕</sup>。段庸生发表于重庆师院学报 2000 年第 4 期的《劝惩与宋人传奇》认为宋人传奇中的劝惩

〔作者简介〕 赵章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四川 成都 610064。

不是简单的说教议论,而是对唐传奇过度追求观感娱乐享受的反正。它于劝惩之中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及对题材价值意义的追求,充分表明宋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格外重视,由此带来传奇从主体到服务对象及审美情趣等一系列积极变化,这些变化规定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主流方向。林辰说:“与唐代小说家相比,宋代小说家更喜欢鬼魅题材。但宋代传奇体鬼魅小说,与唐人的偏重于人鬼情爱不同,走进了以鬼事而展现人情世态的新阶段,即以荒诞的鬼事揭示现实的社会人生。”<sup>[7]</sup>苗壮认为“在文言小说领域,宋代每与唐代并称,仍然保持旺盛势头”<sup>[8]</sup>。薛洪勳甚至认为宋代是传奇小说的继续发展期,“通俗传奇小说在宋前已经存在,但为数较少,至北宋才逐渐发展起来,到了南宋,大体上已形成了一个高雅传奇与通俗传奇平分秋色的局面……这是传奇小说史上一次不容忽视的重大发展。”<sup>[9]</sup>……这些都指出了宋志怪传奇的独特贡献和价值所在。

在宋代志怪传奇性质与地位的论争中,不管怎样归纳其特色,不管承认其独特与否,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毕竟是文言小说史的一个环节,基于内部传承关系,它必然具有前代作品所有的一些共性;但同时它又有自己特具的文化背景如政治环境、外来影响、地域烙印等,形成其独特性。故而在具体评价时,应尽量避免印象式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要在深入反复的作品研读比较中,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估价研究对象,比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就显示,前代贬抑宋志怪传奇的做法是有所偏颇的。

其二,宋代志怪传奇的分期,为不少论者所关注。李剑国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将其划为六期:一为北宋前期(960—1022年),以西蜀、南唐、吴越等入宋之耿焕、黄修复、吴淑、乐史等为志怪传奇小说创作的主力,内容大多是摭拾故国旧闻。二为北宋中期(1023—1067年),作品多数虚实结合,人物事件既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以求信实,又拓开想象空间以求曼衍。风格或文或质,但许多作品更讲求朴素清畅。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写男女情爱的居多。三为北宋后期(1068—1126年),是北宋小说最繁盛的时期,传奇文题材仍集中在爱情和女性上,志怪作品大都不文不质,所叙异事多不新奇。四为南宋前期(1127—1162年),传奇文质量大跌,题材十分狭窄,谈道说佛约略各占其半。五为南宋中期(1163—1224年),志怪创作兴旺,《夷坚志》的出现,反映着小说地位、小说影响、小说自身丰富化的提高和扩大。六为南宋后期(1225—1279年),小说数量锐减,通俗、辞藻两个流派各有擅者,是宋志怪传奇的总结期。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则分为四期,即北宋初期(960—997年),是为初步复苏阶段;北宋中期(998—1100年),是为发展阶段;两宋之交(1101—

1165年),是为转型阶段;南宋中后期(1166—1279年),是为兴盛提高阶段。另如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将宋传奇分为三期:宋初为唐人小说的延续期,北宋中叶至南宋中叶为雅俗融合期,南宋末为衰亡时期。总的来说,这些分期都比较注重外部的社会变迁史,而对小说自身规律的介入相对较少,但志怪传奇的发展原本有其相对独立的轨迹,如《茅亭客话》一般看成宋初过渡期之小说,可是,与唐五代作品相比,它从内容到形式都能独具一格,且“在小说之中最为近理”<sup>[10]</sup>,已完全具备成熟期之宋代小说的特色。可见前述分法不符志怪发展的实际情况,这是今后研究中应该被关注的。

其三,对作家作品思想及艺术的探索也是宋之志怪传奇研究的重要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对其总体评价不高,对志怪《稽神录》、《江淮异人录》、《夷坚志》等及传奇文《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等只作一般介绍,很少发挥,且连《云斋广录》等重要的作品也未能提到,却为后来的研究确立了参照系。其间如赵景深1941年撰文《〈青琐高议〉的重要》指出该书“是从传奇体到章回体小说的桥梁”,且“多被后世取为小说戏剧的材料”<sup>[11]</sup>。这种情况真正得到改观则是在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中,作者详细介绍特别是肯定了部分宋代传奇小说的特色与成就。而在同类著作中尤当推程毅中之《宋元小说研究》,该书准确精当地论述了数十种作品,多有精彩新异之论。如第三章讲到《青琐高议》的文学史意义时指出其已由唐之史才与诗笔合而为一演进到二者的分别发展时期,其偏重诗笔者为以后的诗文小说开了先河。第五章说“志怪小说本来是离现实生活很远的,而《夷坚志》却和现实生活接得很近,在写作方法上向着现实主义走近了一步。”第六章言及《绿窗新话》的通俗化倾向时指明其“为明代的通俗读物《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书开辟了一条新路,它对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交流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他如董上德《论〈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针对前人的观点,对该书的性质作了新的辨析,认为其既非“笔记”,也非“笔记传奇话本集”,而是一部专供“小说”与“合生”艺人参考使用的、以男女风情为旨趣的故事与资料的类编。侯会《〈夷坚志〉中的〈水浒传〉素材》(《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辨析了《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情节、细节、语言等方面对《夷坚志》的借鉴利用。张祝平的博士论文《〈夷坚志〉研究》也对其语言运用及结构特征作了论述。刘守华发表于《高等函授学报》1997年第5期和1999年第2期的《青琐高议中的宋代民间故事》及《宋代的民间故事集成夷坚志》二文罗列阐释了两书中一些典型的民间故

事。赵章超的《宋志怪小说天命观论略》(《广西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则分析了宋志怪小说中天命观的种种表现,并考索了这一上古观念在宋代复辟的思想根源。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但与宋代小说所拥有的丰富作品和广博内容相较,差距还相当明显,比如对宋之志怪传奇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对其地域特色的研究等,连单篇论文也无从得见;再说内部研究,系统探索其艺术特征、内容嬗变的论述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其四,对宋代小说理论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实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否认宋代在文言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如李剑国说宋之文言小说因遵循实录原则而导致了其相对于唐的倒退:“这种求实心理和史家传信意识的活跃,不能不造成灵感的枯室和想象力的钝化萎缩。”<sup>〔12〕</sup>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大都角度新颖,视阈广阔。如刘良明《洪迈对志怪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性贡献》指出洪迈“第一次将当时遭人轻视的志怪小说与历来已有崇高定评的史书相提并论,表现了一个杰出理论家的卓越识见与巨大勇气。”且“揭示小说作品寄寓着作家的主观情志,肯定小说创作具有的思想意义”<sup>〔13〕</sup>。王齐洲《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一文,蹊径独辟,从《新唐书·艺文志》着笔,将其与班固《汉书》、桓谭《新论》、《隋志》、《旧唐志》对比,指出“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的故事性(引者按:即其“史传特点”),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极大地丰富了小说体裁,促进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sup>〔14〕</sup>再如萧相恺《宋元小说理论的新贡献》,认为由于受史家实录观念的影响,前人最多就只是偶尔隐隐约约涉及过小说的虚构问题。该文则首先立足于郑樵《通志·乐略·琴操》,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它在小说虚构理论上的贡献,一是其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乃最早清醒地认识并明确指出虚构是小说的艺术特色的理论文章;二是它颇为科学全面地总结出了前此小说创作中虚构的三种主要方式:铺陈夸饰——所谓经传所载“数十言”,“彼则演成万千言”,“或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完全虚拟——所谓“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移此就彼——所谓“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三是它从理论高度阐述了虚构手段的必要和重要,说明了它与表达中心思想的关系。——所谓“顾彼亦岂欲为此诬罔之事?正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

说无以畅其胸中也。”并认为这种有意识的虚构成了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sup>〔15〕</sup>另外如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特征》(《南昌大学学报》, 2001年第4期)从古代文言小说的编排体例着眼,肯定了宋人在小说编辑方面的贡献。总的说来,这些探讨主要集中于专门的小说理论文献方面,而将小说作品与理论有机结合以发掘宋人在这方面为后人留下的有益启示,则是今后进一步研究所应注意的。

其五,文献的考辨辑录方面成就斐然。鲁迅《唐宋传奇集》之《稗边小缀》有对九篇宋代传奇的作者及版本源流的考述。程毅中《〈丽情集〉考》(《文史》第11辑, 1981年3月)钩稽载籍,旁收故实,披沙拣金,于《类说》、《绀珠集》、《绿窗新话》等书选录《丽情集》佚文近四十则,考辑了其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其《宋人传奇拾零》(《文学遗产》, 1995年第1期)考述了残存的《爱爱》、《芙蓉城传》、《王魁传》三种作品的作者及通过不同体裁的传播源流。李剑国《〈青琐高议〉考疑》(《南开学报》, 1989年第6期)一文从《宋史·职官志》及人物传记着手,钩沉索隐,辨明该书卷首所署之“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一语中之孙副枢乃孙沔,“副枢”是其官名,解决了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疑案,进而澄清了《青琐高议》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刘斧的身世和题署不合常例的原因,指出该序既非“坊贾所为”,该书也非“里巷俗书”,实为刘干谒之作。还从文献类比中得出其书散佚颇多的结论,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以为该书保存完整的谬误,指出《青琐高议》与《青琐摭遗》原本二书,澄清了鲁迅先生怀疑后者为前者别集的看法。其《〈夷坚志〉成书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3期)则对《夷坚志》各集成书年代及写作过程作了考证和分析。其他如杨绪容《包拯断案本事考》(《复旦学报》, 2001年第2期)针对学界误以为包拯审案流传后世仅一件或几件的看法,从繁复的文献中考索了其断案之例十三则;张祝平《范成大〈侠妇人〉故事原貌及其流变考》(《文学遗产》, 1997年第4期)从版本对比中恢复了洪迈编写《侠妇人》的最初面貌;李裕民《〈夷坚志〉补遗三十则》(《文献》, 1990年第4期)从《茗溪渔隐丛话》、《岁时广记》、《竹庄诗话》等书辑得佚文三十则。赵维国《〈永乐大典〉所存宋人刘斧小说集佚文辑考》(《文献》, 2001年第2期)辑得《青琐高议》佚文一则,《摭遗》佚文五则,《翰府名谈》佚文一则。而此类著作之集大成者当推李剑国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传奇集》,前书最大限度地搜集占有种种原始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严密地进行考证、辑佚、辨伪、校勘等,为宋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转第148页)

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当张生改弹《凤求凰》时，莺莺又赞道：“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张生呵，越教人知重”。

一个是弹琴的高手，一个是鉴赏的“知音”，通过琴韵使两颗火热的心得到碰撞，迸发出“知音”“知心”的火花。莺莺为此更加“知重”张生。

3. 崔张都富于睿智才思，灵犀相通：例如莺莺知张生高中状元后，特让琴童寄给张生瑶琴、玉簪、斑管、裹肚、汗衫、袜儿六件礼物，表面上是“无以贡举”，“权表妾之真诚”，实际上却大有深意。张生以其敏睿聪慧，不仅盛称莺莺“堪针工出色”而且还猜度“这几件东西都有缘故”：琴是他俩传情的媒介，让张生不要忘记旧情；而玉簪是让他“莹洁无瑕”，不要高中就“撇人在脑背后”；斑管是用娥皇哭舜泪洒斑竹比喻今日“淑女思君子”；裹肚是让他想着莺莺“灯下回丝（思）”，“紧紧系在心头”；汗衫是让他和衣卧，“不信不想我温柔”；袜儿是“拘管他胡行乱走”。莺莺的睿智细心和温柔体贴，张生的灵犀相通，知心自懂，在这个情节中都得到了充分表现。类似例子剧中还有，不再赘

举。正是这种彼此的睿智才思，所表达出的缠绵体贴的相思、知重和温柔，使崔张的爱情日益巩固、不断深化，已大大超越了“体之欲”的初恋阶段。

历史上无数婚恋实践表明：仅靠外貌美的吸引而一见钟情，是无法维系爱情的长久生命的，因为色衰便会爱弛。陈阿娇与汉武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班婕妤与汉成帝、戏曲中敫桂英与王魁、赵五娘与蔡伯喈等等，不都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么？而内在美，即“心之欲所产生的信任”，“智之欲所产生的敬意”，亦即德与才所形成的高尚的人品和卓越才能，却是永恒不变的。它是爱情能永恒持久的主要源泉，能使人铭刻五内，与日俱增，长盛不衰。《西厢记》中的崔张爱情，之所以能历经挫折磨难的严峻考验，正是建立在内在美与外在美相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的牢固基础之上，他们经过八个多月的了解、接触，都了解双方具有共同的叛逆性格、坚强意志、生活理想、情趣爱好、审美观念等等，使原有的外貌美才得以巩固、升华、超越。这才是“有情”的全部内涵。它是“三欲之和”的“理想之爱”，故能超越时空而具有历史的永恒价值。这就是《西厢记》具有永恒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 6, 9.  
〔3〕 孟子·滕文公下〔M〕.

(责任编辑：尹 富)

(上接第 143 页)

础。可以说，宋代志怪传奇这一研究领域，考辨辑录方面的成果是最为可观的，但颇为遗憾的是，其视野则多不出类书、小说集及史料笔记等，而对散佚于别集、总集、方志中的作品注意不够。这方面也还有不少工作需

要继续去做。

综观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百年研究情况，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诗、词、文研究相比，差距却是异常明显的，这应当是以后宋代文学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剑国. 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J〕. 文学遗产, 1998, (2).	〔6〕 韩秋白, 顾青. 中国小说史〔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5. 68.	〔12〕 李剑国.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M〕.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5.
〔2〕 吴组缃, 沈天佑. 宋元文学史稿〔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19.	〔7〕 林辰. 神怪小说史〔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15.	〔13〕 刘良明. 洪迈对志怪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性贡献〔J〕. 武汉大学学报, 1996, (6).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8〕 苗壮. 笔记小说史〔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46.	〔14〕 王齐渊.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J〕. 齐鲁学刊, 1998, (2).
〔4〕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小说史稿〔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87.	〔9〕 薛洪勳. 传奇小说史〔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15.	〔15〕 萧相恺. 宋元小说理论的新贡献〔J〕. 明清小说研究, 2000, (3).
〔5〕 侯忠义, 刘世林. 中国文言小说史稿〔M〕. 北京大学出版	〔10〕 四库全书总目〔M〕. 中华书局, 1965. 1212.	
	〔11〕 赵景深. 中国小说丛考〔M〕.	

(责任编辑：尹 富)